

(后)遗民地理书写:填词图、校词图及其题咏

姚达兑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遗民书写的论式往往是空间地理想象的政治学,“遗民地理的政治学”内涵即现实意义上的“生活在别处”、精神上的“想象在他乡”。世变后的图籍与诗词等文字书写是诗人在遍历沧桑后留作警幻的我执,也是遗民情债的文化补偿与遗民我执的他者见证。《迦陵填词图》及其题咏见证了明之遗民的文字书写与行为书写,即大汕与陈其年的进退出处,表现出遗民地理的政治学意义。如果说清初《迦陵填词图》及其题咏彰显了清词的复兴,民初《彊邨校词图》及其题咏则不仅可视为清词的终结,且暗示了一代文化遗民生活在别处的“想象之乡愁”。后遗民时代的清之遗民沈曾植揭橥了遗民地理的政治学意义,王国维则进一步阐发了遗民地理的文化意义,从遗民地理学到遗民文化学,提炼出了一种关于“文化遗民”的乡愁理论。后遗民地理学的吊诡之处即在于,现实恶托邦的种种不足,想象乌托邦的不能致达,都在既存在而又不可见但又可以作为自我补偿的“无地”——完美而有礼有序的文字异托邦中得到补偿。

关键词:迦陵填词图;彊邨校词图;(后)遗民地理;文化原乡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3)01-02-0057-15

一、引言:遗民的情债与我执

九一八事变不久,郑孝胥即挟逊帝溥仪自天津往东北以建满洲国,随往者有陈曾寿等遗老。其时与郑、陈同声共气的朱祖谋^①则“怒焉忧之,曾属陈曾寿力加劝阻”,又复感叹“吾今以速死为幸”。^{[1]36}朱氏不久辞世,留下一首遗词《鹧鸪天》:

忠孝何曾尽一分,年来姜被减奇温。眼中犀角非耶是,身后牛衣怨亦恩。

泡露事,水云身,任抛心力作词人。可哀惟有人间世,不结他生未了因。^②

后来者重新检视这段历史,须先体认朱氏身为遗民的尴尬处境。所谓“万一逊帝见召,峻拒为难。应命则不但使吾民族沦胥,即故君亦将死无葬身之地。”^{[1]36}他是满清遗老,复辟一事已被证明(前番已有张勋复辟失败)绝不能成功,终是“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他身为汉人,若助纣为虐,则又有伤民族大义,难免落得身后骂名;襄助故君理应是万死莫辞,但值此外敌入侵、天下(非仅满洲)兴亡之际,襄助废帝做起日伪傀儡,则不仅害己,己身虽不足惜,也是害人——故君恐怕也“死无葬身之地”。“君臣之道”“春秋大义”(夷夏之别)两层冲突使他“怒焉忧之”,转念又祈望“以速死为幸”。“水云身”“任抛心力作词人”,则点出其词人和隐者的身份。词人身份

收稿日期:2013-03-20

作者简介:姚达兑(1982-),男,广东汕头人,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员(2011-2013)。

① 朱祖谋(公元1857~1931年),原名孝臧,字藿生,一字古微(薇),号沅尹,又号彊邨(上彊山民、上彊邨民、上彊邨人、彊邨老人),浙江归安人。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充会典馆总纂、总校,累迁至礼部侍郎。光绪十年,出为广东学政,旋即称疾辞归。参见巴蜀书社2002年版谢桃坊所著《中国词学史》一书第384页。古微一号取自《公羊传》句,“朱,古微国也。”《书经·商书·微子篇》:“微,国名。子,爵也,名启,帝乙长子,纣之庶母兄也。”周公旦将商旧都封给微子及其后代,建立了宋国,都商丘。朱氏的父亲曾宦商丘一带,朱氏幼时便随侍宦署。《微子篇》中载微子“痛殷之将亡”,数谏不纳。朱氏以微子自况,故取该号。因此号与彊邨一样,与地理相关,故此赘注。

② 此词不仅紧扣“君臣”“忠孝”等伦理范畴,而且也关涉儒家伦理的其他范畴,诸如“姜被”一典关乎兄弟之情,“犀角”一典关乎父子之义,“牛衣”一典关乎夫妻之道。其详细解读参见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林立所著《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究》一书第41-44页。

始自戊戌改良和庚子祸乱,他四十始填词,其时正与戊戌维新党人过从甚密。庚子乱起,庭对之时,他不顾“亲贵顽固”反对,冒死陈说利用义和拳犹如“置宗社于孤注一掷”。^{[2]813}八国联军围城,他与王鹏运、刘福姚相约以词纪史,存为《庚子秋词》。隐者身份始自辛亥失国,此后即不问世事,萧然往来淞沪间。^[3]词之结句又是何其沉痛,忏尽因缘,不结他生,反映出苟活于民国的遗老心中难以道出的痛苦。

朱祖谋死前有自定词集《彊邨语业》二卷,又自知留下遗词不异于“名心未死”。^①他这一死,虽是销去了遗民身份的情债,却不愿也不能破除文字的我执,^②只能将其留作警幻。

朱祖谋之死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清词并不以清朝的结束而结束,而应以一代遗老的辞世而告终。^③朱氏是满清遗老的代表,堪称清代词/词学在民国的未亡人。朱祖谋易箴前,将校词双砚授予龙榆生,交割了身上的文债,而他的继承者则可免了“君臣”“夷夏”等伦理重责所交织的冲突。是否真的如此?黄宗羲说“遗民不世袭”,龙榆生能袭自彊邨的唯有那怅惘的浓浓乡愁。已无遗民之债,龙氏接过校词双砚,终成为中国现代词学学的奠基人。^[4]朱氏赠砚时,并托夏敬观为绘《彊邨授砚图》。^{[1]35}此后时人陆续有同类的授砚图之作。^④后几十年,龙氏书室恒悬“授砚图”,以示宗风相传,词业有继。然而,龙氏因为朱氏治丧与汪精卫熟络,龙氏自此而后更加穷困侘傺,加上羸质多病,终至行差踏错地参与了汪伪政权。朱祖谋、龙榆生两人的生涯和进退出处的对比,仿佛更可见那绕不开的身份情结中的情债与我执。

《彊邨授砚图》乃是仿《彊邨校词图》而作,其意义之一在于评定了施受两者在词学史上的地位。叶恭绰认为,朱祖谋“集清季词学之大成,公论翕然,无待扬榷。余意词之境界前此已开拓殆尽,今兹欲求于声家特开领域,非别寻途径不可。故彊邨翁而且为词学之一大结穴,开来启后,应有继起而负其责者”。^[5]“公论翕然”的文字见证便来自校词图及其题咏,而“继起而负其责者”则有授砚图为证。

以遗民的视角考察校词图/授砚图,不失为体认朱、龙两人艰困处境的有效方式。进而,通过对图画和题咏的考察,更可将一个遗民群体的社交网络及其共持的观念呈现出来。授砚图的前身是校词图,校词图又是填词图的后世,在校词图的题咏中常常互文指涉《迦陵填词图》。因而,下文的讨论将追溯到最早的同类作品——明代遗民大汕所作的《迦陵填词图》及其题咏。



图一 夏敬观重作《彊邨授砚图》

① “语业”者,言语自造的业障,忧患和因果的根源;“名心”者,既是对文字慧业的最后固守,也是一生种种我执的见证。助印《彊邨语业三卷 弃稿一卷 彊邨词剩稿二卷 彊邨集外词一卷 附世系 行状墓志铭一卷 彊邨校词图题咏一卷》者十五人,都是彊邨一门师友,得银计一千八百八十元,仅汪精卫便助资四百元。

② “我执”此处引申代指遗民们对“我”之身份(即前朝臣子)念兹在兹、不释于怀的境况。

③ 龙榆生编《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一书时,因陈子龙、王夫之诸家为明之遗臣,不愿降清,故而是集不能以“清词”为题名。同样的情况,词虽可以朝代分,却不应以朝代兴亡为限,而更以词家和词作为准。

④ 《彊邨授砚图》作为插图载于龙沐勋所著《忍寒词》(1948)一书,此1931年夏敬观依彊邨逝前所嘱所作第一幅《彊邨授砚图》,彊邨逝前亲见,此图至今未知下落。上图为夏氏多年之后(1948年)为龙氏再绘之授砚图。十几年间,还有徐悲鸿、吴湖帆的同题画作。据笔者所知,授砚图至少有七幅之多,每幅之上皆有非常可观的题咏。

二、遗民地理书写:《迦陵填词图》及其题咏

填词图诸作,现存以明代遗民大汕和尚于康熙十七年戊午(公元1678年)为陈维崧^①所画的《迦陵填词图》为最早。^②图中人物有二,右边陈其年左手拈须、右手提笔,望向其右边歌僮,神情若有所思;左边女性装着、坐于蕉茵之上的是他的男伴紫云,手执一箫,旁置一琵琶、一箜篌。有图辞“为其翁维摩传神 释汕。”有印三,右边一印为白文“看松”二字,左边两印分别为朱文“大”、白文“汕”。^{[6]356-361}



图二 大汕绘《迦陵填词图》(一作《陈其年填词图》)

注:乾隆年间(1794年)刻本,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明亡之后,遗民处于政治的地理边缘,为免被征入仕,多以消极的方式抵抗。或遁居山林,参佛谈禅之际,机锋仍是直触君臣恩义,埋首案头之时,落笔也不免暗藏春秋微言。或厕身游幕,凭三寸舌、一支笔,作伺机而动的纵横客。岭南虽为僻壤,禅林曹洞一宗却有不少明代之遗民依附,方以智与大汕和尚即为两例。^③钱穆先生认为,方以智明亡后虽入空门,但“显然仍是胜国一遗老,不得以一禅师目之。”^[7]同样,大汕作为明

^① 陈维崧之父是明末东林党人陈贞慧,与方以智、冒襄、侯方域并称明末四公子。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清代碑传全集》上册之蒋景祁所撰《迦陵先生外传》一文第241页。明亡后,冒襄收留了故人之子陈维崧于水绘园中,居住达十几年之久。陈维崧未应博学鸿词之前,已经与董以宁、邹祗谟、黄永三君,有毗陵四才子之目。

^② 关于《迦陵填词图》版本研究,参见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广州市博物馆主编的《镇海楼论稿》中姜伯勤先生所撰《石濂大汕〈陈其年填词图〉研究》一文第120-129页,以及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08年版毛文芳所著《图成行乐:明清文人画像题咏析论》一书第360页。笔者阅读的是如下两个版本:其一,积学斋徐乃昌藏书之宜兴陈氏药洲缩绘合刊本(公元1794年)大汕绘、诸家撰《陈检讨填词图:附题词》,现藏于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其二,1937年8月由西泠印社名宿丁辅中(鹤庐)借中华书局刊行之《陈其年填词图题咏》。

^③ 方以智与大汕同属曹洞宗觉浪道盛门徒,两人皆因罪被拘,皆死于遣送归乡的途中。大汕自称是觉浪传人,打着其旗号招摇过市,甚至自承法嗣,后来又设法嗣传给安南国主。时人已有对其是否为觉浪直系传人有怀疑和讨论。大汕是否为觉浪传人,或可存辩。但毋庸置疑的是,他受觉浪一派影响甚重,至少是私淑门人。离六堂自叙称“吾洞山老祖……”,参见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版《大汕离六堂集》第36页。“大汕,号石濂,觉浪禅师门徒,密之(方以智)法弟。”参见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任道斌所著《方以智年谱》第284页。

之遗民，亦当被如是观。

释大汕(公元 1613~1705 年)，字厂翁，号石濂，原籍江西九江。^{[8]139}明亡后披薙为僧，逃至岭南，后为广州长寿寺住持。陈眉公羨称他为“剑中侠、诗中仙、画中禅”。^{[9]1}他投靠平南王尚之信，以学问僧为王府常客，交游遍天下。他有鲁班之巧手，能制工巧家具，善为布设寺园。他曾临摹明代内府名画，故工绘花鸟人物，犹擅仕女。其画论也本色当行地指出中国肖像画可分南北两宗，后人备称允当。^①他是个狂禅怪僧，以阮籍青白眼轻侮时人。他应邀至安南顺化传法，国王阮福周受戒称弟子，他也因而被封为国师，这也是他获罪的根源。尚藩被除之后，他失去靠山，而其同乡“旧友”潘耒向他求贿不得，遂举报他“通洋罪”。他因而被拘，死于押解途中。

自潘耒罗织大汕种种罪名始，又经王士禛等人发挥，时人、后人对其多有指责。潘耒甚至刻行《救狂砭语》一书以道其罪。“其所出微，不欲尽言。幼而警敏，善画士女，作诗有佳句，有故出家，踪迹诡秘。”^{[10]1684}年，王士禛到广州，为结识大汕曾投诗相赠。在潘耒攻击大汕后，王氏也倒戈相向，责骂大汕为“妖僧”，并说当时他“奉使至粤，闻而心恶之”。潘氏责其行“大言欺世”“存心险毒，以倾人陷人为能事”，而其著则“有伤国体”“有碍法门”。^{[11]88-89}

时人对大汕的攻讦皆在平南王尚藩倒台之后，这可看作是清政府的权力自政治中心向边陲的扩张，而大汕之死因实则是皇权在政治地理上一再实践的结果。在大汕有后台时，人们对他备极赞扬，而在其失去倚靠时，却又对他大加攻伐。主要的罪名一般有二：他身为方外之人，却善画“妖女”；出入王府，又通洋为安南国国师。毛文芳将时人对大汕的批评归结为两种：其一，“站在教界伦理世俗道德的角度来看，以王士禛为主流意见的人品负面评价。”^{[6]376}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中即评：“惜大汕人品不堪，宗风扫地。以工为秘戏图，得当路欢心，卒以违禁取利毙于法。详王渔洋《分甘余话》。此图出其手，是一大玷耳。”^[12]其二，认为他“才情奔放，行为脱径”；因有奇人性情，故有“惊世动众的轶轨之事”。^{[6]377}以上两点固然是实情，然则未能道尽其细理。吾人唯有明白大汕为明之遗民，才能理解他的种种“不法”之举。因为于他而言，这些世法和清廷的意识形态已不能使其敛才就范。前人已道出时人对他的攻击大半是深文罗织，语焉不详。但是有一点未道尽的是，时人罗织那些罪名却不敢指涉其遗民身份和反清主张。或许是因与大汕交往的名流几乎囊括天下名士。清初三藩倒台时，文网已密，时人唯有不提及身份，而且暗中攻击他，才能全身而退。

有清一代的史籍也不曾提及大汕的遗民身份，唯有同时期稍后在地理上处于权力边缘的安南，才有史籍记载确证。时人语焉不详地说他“有故出家”，“抱天人之略，负匡济之心，以菩萨愿力，幻迹禅林；乐道之余，托文章著述以明志”，“固谓其异人列有托而逃于禅者也。”^{[8]12-13}所谓“有故”，时人应该是知晓，但不敢道出。而在越南的史籍中，因著者与大汕有交往而又无安危之虞，所以敢指出大汕的隐衷。“石濂和尚号大汕厂翁氏，清浙西人。……明季清人入帝中国，濂义不肯臣，乃拜辞老母，剃发投禅，仗锡云游，凡山川名胜足迹几遍。”^{[8]139}“义不肯臣”才是逃禅的真正原因，也可知其僻居岭表，游幕藩台，也是不得已之举。

首次道出“大汕在清初仍坚持为明之遗民”的是遁隐于广州、澳门的清之遗民汪兆镛。汪兆镛、汪宗衍父子先后续写《岭南画征略》，论及大汕及其画艺成就。在再跋《释大汕白描罗汉》中一语道破，“今和上之为人，岂与枯寂浮屠同日而语乎？亦有所托而逃焉者耶？……知(曾)青藜与大汕皆明遗民，故沆瀣相契。”^{[13]374}越南出版的《大南实录》一般读书人无法接触到，故而首位力主大汕为明之遗民的正是汪兆镛。汪氏在清亡后以遗老自居，不仕民国，任民国政要几番再请，其弟汪精卫屡次劝出，他都誓示不忘旧朝。身为清之遗民的汪氏寓居僻壤，在研究书画之中，寄寓了他的身世之感。故而他能读懂大汕为明之遗民不愿仕新朝者，其中多

① “汕韶龄得座，披衣之暇，颇事挥染。究心古人，颇有年所。而最得力处，则于都门冯涿州相公家金鱼池斋中所藏大库本不下百千。”参见学林出版社 1999 年版姜伯勤所著《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第 374 页。“大汕自撰《维摩诘经变图》”题记，文中论人物画之南北宗，独具只眼”。参见新文丰出版公司 2000 年版《大汕离六堂集》之饶宗颐所撰《重印离六堂集小引》。

半也有夫子自道之意,投射进了自我的想像。近人从汪氏说并论证大汕为明代遗民身份的有中山大学姜伯勤先生,认为“他不是‘诸生’出身,不是士大夫。但正如汪兆镛先生的判断那样,却是一名守护中华文化的‘志士’和遗民。”^{[13]42}

遁入空门的大汕无异于置身和彷徨于“无地”,大汕固守明之遗民的身份应该是时人都清楚而不直接道破的。正如他门下弟子曾青藜说他为避祸而入空门,隐在文字,又在《寄怀石濂师》一诗中感叹大汕身份:“百年家国人何在,万里关河梦不归。”^{[14]224}大汕在广州建长寿寺,而地方志却不敢记载在案。杭世骏《过离六堂伤石濂大师》(《道古堂集》)也感慨:“纷纷志乘无公道,缔造缘何削此翁。”原注:“省、府、县志皆不言师建寺。”^{[14]225}翁方纲曾为该图题诗五首,在收入个人诗集时,关于大汕的部分,皆删去。^①大汕著作在乾隆年间被列为禁书。^②引起新朝与仕新朝的文人大有不满,是因大汕对旧朝的依依眷恋。

对大汕而言,眷恋旧朝既是外附的情债,也是内在的我执,这些都在其诗集《离六堂集》中得到充分的表达。“离六堂”一名出现在他的诗句中,也是他驻锡的广州长寿寺中的堂名,再后来其诗集也定为此名。他在安南国中时,一晚从国王为其所设的歌舞酒宴上归来,赋成《禅林即事诗》五首。最后一首有“善病任他尘事扰,避喧犹恐志人嘲。归期风信占河洛,卜得重离第六爻。”^{[8]14}“重离”为“离为火第三十”卦,第六爻“上九”辞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周易正义》“正义曰:‘王用出征’者,处离之极,离道既成,物皆亲附。当除去其非类,以去民害,故‘王用出征也’。”又[疏]正义曰:“释‘出征’之义,言所出征者,除去民害,以正邦国故也。”身在安南国中的大汕情知若能凭借此国之力,“大事”或许也能成功。他写下此诗,用意可谓极其隐晦。君臣之义未尽,是他念兹在兹、不释于怀的情债,故而他将堂名定为“离六堂”,以示不忘大仇未报。他更大胆地将此义在其出版的书中大加发挥,“(为)君臣道合,君不偏于正,臣不正于偏,一路知斯旨者,始可以言禅,并可以言诗。诗诚事君事亲之资,方外人亦所不废。故言《易》不知君臣,言吾宗(按:曹洞一宗)不知正偏,言诗不知忠孝之道,是皆失其本者。”^{[9]36}所谓正、偏,是权力地理上的中心与边缘。但是,身在方外如他,又何来君亲,又有哪种君亲之道?由此可见其耿耿不易的心态。然则,他的这番曲衷诡论当然未为清初的贰臣和名流所接受。

《离六堂集》中借助身处边缘的孤臣孽子之事迹,以抒发其对旧朝忠心的心绪也有不少。卷四《为王夫人殉节歌》一首哀悼了某位同样是遗民的王夫人。“太平天子臣,离乱天下贼。纷纷享富贵,几人念君国。宛平有王母,须眉不可及。从容就义何英雄,慷慨全家抱志同。海枯石烂终难易,皎月为心气贯虹。”^{[9]88}首句今昔对比强烈。昔日太平之时,是天子之臣,今日离乱之时,反倒成了“贼”。他为那些纷纷投靠新朝得享富贵的贰臣感到羞耻,而盛赞“从容就义”、忠君全节的行为。在另一首诗里,他向友人表达了对乱世余生的诸多感慨,但又不至于销尽心志。“满匣恩仇留宝剑,一碑风雨断文章。欹斜茅屋疏林下,野老逢人说战场。”(《太息小集长寿,与梁药亭、陈元孝、屈翁山诸君分赋》)^{[9]144}在寄赠并赞扬好友的诗里,他又寄入了连连的自我喟叹,“由来辟谷逃禅者,大半英雄乱后身。”(《赠张超然》)^{[9]167}这何尝不是夫子自道?道出了遗民在世变后的进退出处之艰,天地虽宽无处容身,唯能寄居僻壤、遁逃方外,辟谷逃禅,为道为僧。

大汕之死也甚蹊跷,无法在地理上作出确认。因受人妒而得罪名,后被“押发江南原籍,死于道路。”^{[11]88}然而事实上,竟然连时人都无法确认大汕原籍何处。连王士禛那样的天下名士,曾与大汕有深交、后来又绝交,竟然也不知大汕从何而来。^③王氏《甘分余话》“妖僧大汕”一条录:“广州有妖僧大汕者,字石濂,自言江

① 翁方纲为是图题诗五首,另有三诗不收入《复初斋诗集》,原因应是涉及大汕。两诗如下:其一,“麝提每借画通禅,弹指三生翰墨缘,故着禅人工浣笔,蒲团个是佛光圆。”其二,“鬢丝禅板梦模糊,夹立天魔境更殊。洞府碧桃粘着未,抵他丈室散花图。(先生别有天女散花图)”其三,“张三影后毛三瘦,韵撮应从词曲听。柴沈遗书定谁是,欲凭词语问西泠。”参见中华书局1937年版丁鹤庐鉴定之《陈其年填词图题咏》。其余两首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续修四库全书》1454册《复初斋诗集》卷第十三第466页。

② 大汕《离六堂集》曾被列入《禁书总目》《浙江省查办应缴应毁书目》《江苏省奏缴咨禁书目》。参见中华书局1985年版英廉等编《全毁抽毁书目 禁书总目 违碍书目》。

③ 王士禛或是故意混淆大汕原籍,以示与罪人无涉。

南人。或云池州,或云苏州,亦不知其果籍何郡。”^{[11]88}王氏开列的乡籍。又与两处记录有矛盾:越南的史籍记录他为浙西人,然而他梓行的著作又在扉页标明他籍属“西江”(江西九江)。几份相互矛盾的乡籍记录或许是大汕自设的迷障,以期混淆视听,但是也侧面反映出一种自我认同的困境。明亡之后,对他而言,“乡关何处”已是大大的疑问。故乡已是异乡,异乡殊胜故乡。普天之下,已属满清,哪里还有原乡?或许原乡就是他自己本身,还是他的文字或图籍?他僻居岭南后,又游历潮州,一路写成的《潮行近草》中,有一些诗便是写给在潮抗元的宋之遗民。在过澄海县陆秀夫丞相墓时,他赋诗:“荒丘归正气,想见古人风。报国臣应尽,旅忠死不同。山高流水白,日落断碑红。宋有一抔土,还因葬陆公。”^{[9]292}陆秀夫负幼帝投海,仿佛将身肩的情债/政责一起投入茫茫大海。情债一销,但英魂不亡。其最后的行为犹如遗民的书写一般,留下了精诚忠心的表征。故而,宋虽亡,但因此地葬有不肯降元的宋代遗臣,所以从理论上讲,这块墓土仍属宋土。由此进而可明,遗民的文字书写与行为书写之间的密切联系。大汕远离京都,寄情山水,足履迹及中国的荒山野岭。最后又僻处岭表,行走于潮州,传法于越南。他的行为书写与文字书写紧密相关。他行脚下旧王朝的山山水水已易他姓,他避无可避,最终又被押解回故籍。然而故乡又在何处?恐怕已是回不去了。故乡永远不能致达,最终只能死于归乡途中。

《迦陵填词图》题咏除原件之外,现传两个版本:乾隆年间刻本几乎将清初名家一图打尽,道光年间拓本则在乾隆刻本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些题咏,所录诸家前至明之遗民,后至道光年间桐城名家。冒鹤亭称:“检讨举鸿博日,有《填词图》,释大汕画。……《填词图》闻在项城袁氏。叶兰台师有摹本,余亦见之。”^[15]据此知,陈维崧应诏将赴京举博学鸿词时,大汕作画赠别,此时两人相知相识已十有五年。从冒鹤亭的介绍可知,晚清民国之际填词图的渊源、流传和存在是众所周知之事。

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入图者后衍为宋诗一脉,大汕作《迦陵填词图》,则将清词一脉打通。经过陈家几代人广征大江南北名流题咏,一图录尽阳羨派、浙西词派、两次鸿博诸家鸿爪,题词则诸体俱备、洋洋大观。大汕作此图和陈维崧的应征鸿博可看作清词复兴的前兆,在此之后,陈维崧在京都与朱竹垞合刻《朱陈村词》。该书“流传入禁中,曾蒙圣祖赐问褒赏”。^[16]1679年,《浙西六家词》合朱彝尊《江湖载酒集》、李良年《秋锦山房词》、李符《未边词》、沈晔日《茶星阁词》、沈岸登《黑蝶斋词》以及龚翔麟《红藕庄词》六家词集,陈维崧为之作序。谭献《篋中词》称:“锡鬯、其年出,而本朝词派始成,……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17]而这些词家,阳羨、浙西诸家,甚至是陈、朱两人影响的后来者,都在填词图上留下题咏。

此图被陈维崧带至京城,随着陈氏誉满天下,一时名流题咏甚多。时人感叹的是他的身世,赞叹的是陈氏的才华,多事者不免稍加演绎,将他比作东坡或者柳永,而不顾两者词风相去甚远,意在表明陈维崧所受欢迎的程度。此图乾隆年间有朱彝尊所题隶书“填词图”,后来的拓本又有翁方纲题“填词图”。朱彝尊题《摸鱼儿》一调,“擅词场、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风烟一壑家阳羨,最好竹篱乡里。携砚几,坐罨画溪阴,袅袅珠藤翠。人生快意,但紫笋烹泉,银箬侑酒,此外总闲事。空中语,想出空中姝丽,图来菱角双髻。乐章琴趣三千调,作者古今能几?团扇底,也直得樽前,记曲呼娘子。旗亭药市,听江北江南,歌尘到处,柳下井华水。”^①陈维崧从曾孙陈琳本在乾隆本的末尾题:“浙西词客先倾倒,朱李同时是子云。”指的正是题咏之中,浙西词人非常多,而朱彝尊(竹垞)和李良年(武曾)便是其中较著名者,两人也与陈维崧一样受荐试鸿博。陈琳林也不避讳,“蕉茵许坐石榴裙。(公《紫云砚铭》云:‘捧持何必石榴裙’)。”指出的是陈维崧爱乌及屋,将自己常用之砚也名紫云。

这幅画之所以如此著名,除了作者身世,即为明臣后代、词家好手之外,还有一点是受赠者的私人生活,即陈维崧与其男伴紫云的关系。纳兰成德著词如是:“乌丝词付红儿谱,洞箫按出霓裳舞,舞罢髻鬟偏,风姿

① 上阕所谓词场“青兕”,是以陈维崧代比辛弃疾,而下阕又将其比为柳永。“空中语,想出空中姝丽”,指的当然是大汕身处空门,却能绘出美女,但是图中女子实为当年陈维崧在水绘园中的“云郎”。云郎,并非女身。

真可怜。 倾城与名士,千古风流事,低语囁卿卿,卿卿无那情。右调菩萨蛮”。^①陈维崧/词家/名士、紫云/红儿/倾城两者协作,行乐传情,应为千古风流的典范。

题辞者借故将陈维崧与紫云的故事多作发挥。毛际可题:“想年来应诏金门,预制宫词三迭。”查铤称:“恰琼楼高处,相要君恩早眷。”高士奇《渔家傲》:“何事宫商频错,误邀郎顾,郎今要入金门去。”都是预设紫云念陈维崧欲离此赴诏,故而欢事触动愁思。最巧的是洪昇所题的曲子:“(玉交枝)词场名噪。赴征车,竟留圣朝柳七郎,已受填词诏。暂分携,绣阁鸾交。梦魂里,怎将神女邀。画图中间翻把真真叫,想杀他,花边翠翘,盼杀他,风前细腰。”“填词”已泛指向科举功名等,此处遗民的情债也由新朝的皇恩抵消。可巧的是,洪昇借这一“情节”而敷衍成男方离开女方,远赴他乡。

“告别”的主题指向的仿似不仅是陈维崧告别云郎,而且是普遍的离别主题,或特别的案例——他与大汕自此长诀,文人戏作却似写出大汕与陈维崧的关系。毋宁说陈维崧告别紫云晋京应诏一事可看作一种象征,喻射了大汕从此与陈维崧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自此后,两位遗民一个晋京应试新朝,一个固守地僻处岭南。

通览所有题辞,可知清初诸名家所题大多指向画中人陈维崧与紫云的关系,而清中期的续题诸家则在此之外,还涉及作画者大汕与陈维崧的互动。续题诸家中,乾隆辛丑状元钱棨《沁园春》下阕有:“写真有六朝僧,笑老辈风狂得未曾。恍维摩病起,蒲团稳坐。曼殊悟澈,宝筏偕乘。香草金身,昙花天雨,解说空空色相。能听按,板抵一声清磬,风度迦陵。”画者/六朝僧/大汕、对象/词人/陈维崧形象相互重迭,作图/作词本身便是践行的悟道。“解说空空色相”则意在表明,本质虽空,也得借赖色相/磬音,甚至说法的维摩,进而悟道。嘉庆道光年间的梁章钜题:“故家钩党本清狂,聊耗雄心绮语长。天女维摩俱幻相,散花妙谛悟空王。”“故家钩党”道出了陈维崧的祖、父两代本是东林党人,旧时的雄心无法实现,在新朝却化作“绮语”。图里词客、红儿此际正在行乐,诗外之意却是天女、维摩现出幻相,最终隔代续题辞的词客悟出的是佛学的空空妙谛。桐城文派的管同也续题于该图之后,表明了这种隔代的沧桑。

绝代才人,梁园头白,丹鹤衔书才驻。佛子多情,丈室维摩,付与骖鸾仙女。金门题笔,可不似、一天花雨。过百年,剩此丹青,人间幻境如许。

想尔日、销魂有处。要舞扇墙边,踏歌春暮。却愁纤腰,脂浓黛浅,鸾发玉腮犹妒。紫蛤红蛭,且日向、词场酣聚。快心时、那信头陀,忤除绮语。 调寄百宜娇

管同此词上阕写尽人间沧桑。百余年前,佛子(大汕)多情,画下陈维崧人生的转折点。“丹鹤衔书”“金门题笔”,盛况可谓无可伦比。然则时过境迁,唯余图籍证明当年的种种“多情”。下阕进而勾勒渲染昔日(尔日)盛况,结句“那信头陀,忤除绮语”,既回应了上阕叙写大汕作画的“佛子多情”,其实也点出了诗词(乃至文学)之道并不在悟道、证道后抽空一切,反在执着于“多情”,以情寄道。词家多情,反而是道成的肉身,这一点在大汕的《离六堂集》中得到充分的证明。毛文芳认为管氏此词,“词宗陈维崧/说法者维摩诘、女乐徐紫云/散花之天女;同时也是对画面外阳羨派词宗的想象;词学/佛法,两画不约而同地呈像,亦让词学与佛法彼此指涉。康熙初年的一幅画像,在百年后题者的观想中,由一则世俗化的恋情艳事,提升为一段神圣化的宗教解悟过程。”^{[6]427}词学与佛法的解悟是后人所加,然而这种解悟进路,大汕已经大为发挥,阐明诗学与佛法的关系,似乎有自我辩解的意味。所谓“故言《易》不知君臣,言吾宗不知正偏,言诗不知忠孝之道,是皆失其本者。”以此论解诗,似乎便可明白何以大汕能以禅存诗,以诗存寄君臣之道,正如后来常州词学以词存史一样,进而达于春秋大义的经学微言。

^① 此首与纳兰性德集子中的词稍有不同,可知容若后修改了此词。现流行版本如下:“乌丝曲倩红儿谱,萧然半壁惊秋雨。曲罢髻鬟偏,风姿真可怜。 须髯浑似戟,时作簪花剧。背立讶卿卿,知卿无那情。菩萨蛮[为陈其年题照]”。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张草纫笺注之《纳兰词笺注》第78页。

《迦陵填词图》百余年间咏者遍及天下名家,然则大汕作完此图,没有留下任何诗词,^①而且自此之后便与陈维崧断了联系。多少年后,大汕重过毗陵,重忆过世多年的旧侣,不禁发悲声为歌行。

出处各不同,生死同关切。……忆昔与君良会日,君年三九我廿七。不期探古滞梁园,论文不让因相识。……气吐虬髯翻霹雳,大内声闻征上客。弘词直达九重天,召对风流过李白。帝里春风乐更饶,看花蹀躞紫骝骄。野僧足迹庾关隔,相思日望共逍遥。……生恨未寄书一纸,死惭未奠酒一杯……

过毘陵哭陈其年 大汕^{[9]91}

此诗起笔其实就暗示了两人的立场差异,所谓进退出处各不相同。这首长诗的转折处在于“大内声闻征上客”句,陈维崧应诏晋京赴博学鸿词试,从此大汕与他便失去了联系。照理说,陈维崧和大汕两人交游都极广,要相互联系应非难事。为何两人从此便不通音讯?为何从此一个是居易京城,已然是誉满天下;一个是僻处岭南,无异是自我流放?两人老死不相往来,直至陈维崧逝后多年,大汕重过毗陵,旧游如梦,才忆起故人,凭吊伤怀。

要之,两人的进退出处和滞居之地表现出了遗民地理的政治学意义。王德威先生尝言,遗民文学所触及的命题是关于时间和记忆的政治学。^{[18]62}诚哉斯言!在断裂的时间里,怅惘的记忆远得无法追溯。江山易主,词客销魂。遗老也相继凋零之后,想象的乌/异托邦流放在时间的洪荒之中。进而可言,遗民文学的论式多数时候更是空间地理想象的政治学,姑称之为“遗民地理的政治学”。

此在的离散空间是遗民的历史原罪之源,而彼在的想象空间则是罪身所寄的异域。从实际的空间上看,自大汕作此图、陈维崧晋京后,一位是“帝里春风乐更饶”,而另一位“野僧足迹庾关隔”。这种遗民地理的政治学内涵,第一层是现实意义上的“生活在别处”,即如大汕愿作“野僧”,固守岭南;第二层是精神意义上的“想象在他乡”,展现在固守于文化的原乡。

遗民身上的前朝恩义或者生于前朝的原罪,使他们在世变之后,身上背负着未能偿还的情债,而固守的我执,其意义不但在于一姓之兴亡,更在于恩情和道义背后所牵带的文化遗产。对大汕而言,图籍、诗词,甚至是佛法,都是转寄他心中君臣忠孝之义(春秋大义)的载体。一方面,他明知历史之为虚妄,也如佛法之为空空,然而一切情债并不因死亡而销去。另一方面,他又必须藉这种“我执”,将遗民(文化)的情债/重责存留下来。即如他在诗句中提出的论点——“宋有一抔土,还因葬陆公”一样,这种意义上的文字、诗词、图籍,乃至佛法,实可看作遗民抒情疆域之所在,也是遗民情债的文化补偿和我执的他者见证。

三、后遗民地理书写:《彊邨校词图》及其题咏

如果说清初《迦陵填词图》及其题咏彰显了清词的复兴,民初的《彊邨校词图》及其题咏则不仅可视为清词的终结,且暗示了一代文化遗民生活在别处的“想象之乡愁”。

笔者所读《迦陵填词图》旧为晚清第一藏书家徐乃昌^②所藏。封面页上有墨迹,题为“陈其年先生填词图刻本,宣统三年辛亥七月望日,徐积余观察见赠。越三日灯下,今非居士题。”辛亥七月望日即1911年9月7日,此时清廷已是岌岌可危,不到一个月之后便是武昌首义。“今非居士”未知何许人,应是徐乃昌的挚友。

① 这是非常奇异的现象。大汕为人作画时常题有诗词,或者为他人的画题诗词。然则,翻遍大汕留下的文集,不曾见过关于此图的一字一词,仿佛此图并不与他相关。笔者的推测是:大汕或许曾为此图题词,然而因文网危险之故,后人将图上或者文集里的题词删掉了,这种情况在清初是完全可能的。另有一例补证,填词图上所署的字迹,拓本与原本(木刻本)并不相同,如木刻本是朱彝尊所写隶书“填词图”三字,而拓本和重印拓本则将此挖掉,植入翁方纲的“填词图”隶书题辞。

② 徐乃昌乃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出版家。对其而言,藏书、印书是文脉赅续最有效的方式。民初栖居于上海的遗民“因为深通古籍版本之学,故多依附藏家,从事搜罗编纂。”参见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林志宏所著《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一书第54页。徐氏寓居上海,是朱祖谋的好友,曾与其合编《上海通志》。辛亥年,徐乃昌为朱祖谋印行《皖鞠录》。1917年,扫叶山房重印《皖鞠录》,编排和选诗稍有不同。是集虽为戏作,乃是着意集清人名句赏玩,颇有在国变之时又回头彻查清人诗歌成就的意味。

为何以“今非”为号,却是令人遐想联翩。“今非”的等义便是“昔是”,然而昔是的黄金国已化成永恒消逝的无法追溯的历史。

《疆邨校词图》共四幅。首幅由顾鹤逸作于1915年5月,时袁世凯初任总统,致聘疆邨,疆邨“笑却之”。第二幅由何维朴作于1916年,时王国维自海外归,疆邨邀为该图题序。第三幅由吴昌硕、吴待秋和王竹人三人合作,未能确知几时所作。第四幅由吴昌硕作于1925年,此年孙中山逝世,疆邨赴天津面谒溥仪,又自道“兵事稍歇”。^①四幅校词图自作图之时始,陆续有遗民题辞,寄寓世变哀感。校词图题咏诸作在疆邨逝后,由龙榆生辑录成书,附于《疆邨语业》后。统观是书,可知顾氏所作的第一幅图,题咏之人在清代或曾出仕或有功名,诸如顾麟士、郑孝胥、瞿鸿禛、陈三立、杨钟羲、夏敬观、缪荃孙、胡嗣瑗、罗惇齋、陈衍和黄节等,皆属老辈。而何氏所作的第二幅图,所题者大多为比顾图题咏者小一辈,清亡之后,仍当壮岁,如沈曾植、王国维、黄孝舒等人。这些仍在壮岁的遗民与老辈遗民不同,不会只将眼光置于已经远逝的过去,更常将想象展开在不可能存在的未来。



图三 何维朴绘《疆邨校词图》

何维朴所作校词图极为重要,该图作于1916年阴历五月,是年秋天有沈曾植和王国维的题序。在这一年,不少遗老——如沈曾植曾参与密谋下一年的复辟,而王国维自辛亥去国五年之后刚归来。何图被收入龙榆生自编的《风雨龙吟室丛稿》书首,可见其受重视程度。^[19]沈、王两序虽晚出,但被编者置于《疆邨校词图题咏》一书卷首,有深意寄焉。

该图所画,只见众山环绕之中,有茅屋三两间,隐然有一二素心人,商略词业。苍莽天地间,仿佛唯有此等事业,才是第一等大事。远山绵延,又似乎通往洪荒之尽头。松柏挺立,象喻了素心人的高洁品行。似此荒野的景象,真是古图中的疆邨?还是想象中的乌托邦?又或是处处曾是、无处可寻的“无地”?该图又有何奇特之处?

沈曾植自云写序前疆邨数次嘱题。“逸社冬集,疆邨以校词图属题,为诗为词皆不就,久而无以应也。病山屡促之。”沈曾植也是一时无二的杰出诗人,然而社集时疆邨以图属题,却皆不能就。他对该图有一种怎样复杂的感情,读者未得而知。与图相似,词之所寄也不仅在形而下的世变,而在形而上的正劫毁濒危的风骚传统,乃至华夏文明。

沈曾植后因读《直斋书录解題》而悟朱疆邨的伟大功绩,才作此序。^{[2]815-816}如其他人一样,他首先肯定了

^① “乙卯岁,一至旧京,袁世凯方为总统,优礼旧僚,欲罗致而不得,闻其至,急致书聘为高等顾问,笑却之,未与通一字”。顾氏的画正作于此时。“乙丑,谒天津行在,諄諄于典学、生计两端,忠诚靖献,仅止于此,每言之深恫也。”参见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卞孝萱、唐文权所编《民国人物碑传集》第625页。

疆邨校词这一文学行为在千年词学史上之意义，^①强调了疆邨作为千年词学大结穴的历史地位。“盖词起五代，越三百余年，而有长沙汇刻，又越三百余年，而有海虞毛氏之刻，又且三百年，而后有居士之校刻也。”^{[2]815}虽然校词一事初起自王鹏运，^②但后续者朱氏反比王氏更精进。朱氏“宗万氏而益加博究，上去阴阳，矢口平亭，不假捡本，同人惮焉，谓之律博士。”可知其填词、校词极为讲究，能校正前人巨著如万树《词律》，其精深胜过王鹏运，因而可谓当晚清之时是朱氏才将词与词学发扬光大。“盖校词之举，鹜翁造其端，而疆邨竟其事，志益博一而知专，心益勤而业广，乾坤道息，身隐于文，海内知交，助搜秘佚，校成之词，已刻者一百余家，未刻者方日出而未有已也。轶海虞而反迹长沙，褒然于词苑，可谓富欤。”在“乾坤道息”（指朝代更迭）之世，朱氏“身隐于文”，是有其特殊的意味作为内里。

沈氏最后解释“疆邨”一名在文化地理学上的由来。题咏诸家大多强调此地乃是当年白居易所盛赞的地方，沈氏更将“疆邨”一名追溯至远古，并加以抽象化为象征之物。“疆邨者，居士祖居埭溪，溪渚上疆山麓，唐白文公所谓‘惟有上疆精舍寺’。其后刘商学仙升举地也。……吾浙山水名在《山海经》，而至今可指其所在，按图了然，东惟会计，西惟浮玉、苔水为最古。上疆为浮玉支麓，而埭溪古施渚，则苔水西源。”^{[2]816}常派词学家以词比诗骚，打通整个诗学传统；相似的是，沈曾植特为“疆邨”这一地理名词寻找一个文化的坐标。《山海经》古图之上，尚可查到“疆邨”一名相近的地标，其实在社集之时便已经有题咏提及。

上古的地图已湮没在历史的洪荒中不可追考，难以确切说是事实，而只能说是某种关于地理学的想象图景。遗民地理想象的有趣之处反倒在于，主体投射了过度的阐释。在沈曾植的案例中，他为疆邨找到了依稀可以辨认的“传统”（原乡？）的源头。他继续阐释“疆邨”这个地理名称所牵涉的政教和文化涵义，“禹、益所经，夏少康、帝杼封口之虚，越勾践铸剑之迹，山水精绝，灵物决莽，往往令人俯仰古今，悲思感慨而不可止。”疆邨已经不止是一个地名，而是一个文化名词。因为在这个地方曾经生活过古王和先贤，如禹、益、夏少康、帝杼、勾践（为何是卧薪尝胆的勾践？）。其它题咏者也有相似的描绘，可见这种观念在遗民词人眼中并非殊例。

然而，沈氏又进一步将“疆邨”这个地名的所指虚化，强调这些风景只是“梦想所寄尔”，无异即是哪儿都不是却具象征喻义的“无地”。“居士家在疆邨，平生出入中外，退而寄他郡，图中风物，梦想所寄尔。而长楸夏首之思，感不绝而菟莫达者，鹜翁往矣，独伫眙乎荒谷桂渚之间，淋漓讴调，所自为词与所校之词，乃相与转注绵延于无已。”“疆邨”作为想象的客体，变成了无法再触及的象征物。疆邨填词和校词这两种文学行为是践道的两种方式，可互相转换，又是安置时间断裂带来的忧伤，转寄记忆牵动的牢愁。鹜翁已逝，而“遗留”在人世的遗民更加惺惺相惜。遍览题咏诸词便可发现，有不少遗老在题辞中感叹朋辈故友的先逝，而作为未亡之遗民也垂垂老矣。对兼是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疆邨而言，遗留的更是那不可辨认的“梦痕”（疆邨词中高频率词汇）。

沈曾植的题序结束于此，“辞与词古今字，后世读居士所为与所著录，其将有感于无声之乐，不尽之言乎？世变浸淫文字，是亦非张、董诸先生所及知，而五代之后，复有五代，余惧夫师说不传。或且《花间》、《尊前》视之也。”^③沈氏将民初混乱的局面视为“五代”，遍地枭雄，政纲动荡。沈氏末句又警告读者，疆邨填词和校词这两种文学实践深意所寄远较前代复杂，而其所寄之地却又是难以定位的追寻无处的“无地”。

① 图中所题咏的诗词多指出疆邨校词如何进行，遂后出版的词籍又如何有功词林。叶昌炽在其题序中便具体地解释了疆邨校词所用方法，分别为订律校例、解题校例、存佚校例。朱祖谋最终所辑《疆邨丛书》包括自唐至元总集五种、别集一百七十四种，校勘精审，远超前人。

② 疆邨校词实际上要自王鹏运的影响算起。王半塘“闲暇好为词，词多且工，复校刻其所得善本词于京师，以诏后进。方是时，疆邨与相唱和。”查疆邨与王鹏运约相唱和，是庚子祸乱时期。“鹜翁取谊于周氏，而取谱于万氏”。“取谊于周氏”，是指取词义于常州经学家周济的词学理论；词有寄托。常派大师之后，“词学之业，乃与诗家方轨并驰，而诗之不能达者，或借借词以达之。……亦重于意内，以权衡其言外，诸语焉有国史吟咏之志者哉！”

③ 常派词学大师张惠言、董士锡早岁皆治经学，而后勉力为词，又将词之地位大力提高。张氏《词选序》乃为常派理论奠基之作。词有比兴寄托，意内言外，乃无声之乐、不尽之言。然则，因为清亡这一世变的意味远比之前一朝一朝的更迭更加复杂，前辈经学大师恐怕未能尽识。

正如词作的义涵远非词的字面和文体所能道出一样,校词图所寄之义也远非直观所能读得。黄节《奉题馔尹先生校词图》一诗:“校字殷勤过海虞,古人真意重踟蹰。先生别有沧桑感,难写伤人入画图。”^{[2]829}图画无法再现对象的沧桑之感、伤心之情。校词也是斟定古人“真意”,为何这种“真意”与先生的“沧桑感”相关呢?相似的题词还有不少。一般是前句点明其功绩,指出其为词宗或忠臣,而又转写沧桑世变。周达题词,“论词两宋本堂堂,汲古刊成阅海桑。天水匡山供痛哭,累公清泪助丹黄。”^{[2]831}校词、出版词籍似乎成了世变沧桑的见证,成为遗民寄托或宣泄情感的最佳方式。“沧桑”正是泛指地理空间的世移物换,而“天水匡山”这个地理名词既实指赵宋的灭亡,也借代为满清的灭亡。

黄孝舒的题词也涉及了与遗民情感相关的大量的地理名词。^{[2]824}“开函有获,取悟无方,旷百世而相知,稽一朝之雅。尚只字之识,就正于素心,半策之讹,博征于副本。斯亦校词之乐也。”黄氏进而指出,校词虽乐,实是有隐衷寄入其中。“而侍郎之隐抱,则异于是。沧江一卧,忽值铜驼。魏阙重来,又逢金狄。箕余麦秀之泣,恐近妇人。正则橘颂之章,睠言君子。”“沧江”“铜驼”“魏阙”“金狄”“麦秀”诸词直接或间接地都指向了空间或被重新置换的空间,以表明朝代的更迭。“侍郎栖迟海滨,流离江介。东陵寄命,只帐横流。西塞寻盟,已寒江水。”^①遗民地理学所涉及的字词虽表义在于特定的历史地理,而深涵了情感的意义和文化的政治。

遗民地理的政治学意义虽由沈曾植揭出,但其义未尽,王国维在沈氏题序之后几日,亦作有一序,进一步阐发了遗民地理的文化意义。^②其实沈序已经将“彊邨”象征化,王国维则在沈序的基础上,从遗民地理学到遗民文化学,提炼出了一种关于“文化遗民”的乡愁理论。^{[2]816-817}

王国维之序旨在“以纪世变”,而序文花了很大篇幅对比讨论了卿大夫和士对“去国”和“去乡”在不同时代的态度变化,隐约间指出象征化的文化原乡之所在。

第一个层次是原初意义的,因乡礼的存在,士大夫“有去国,无去乡”。王国维开篇明义即道,“古者卿大夫老则归于乡里。大夫(以上)曰‘父师’,士曰‘少师’,皆称之为‘乡先生’。与于乡饮酒、乡射之礼,皆谓之‘遵’。遵者,以言其遵也。席其宾主之间者,以言其亲也。乡之人尊而亲之,归者亦习而安之。故古者有去国,无去乡。”卿大夫之所以老则归于乡里,是因为乡里还存有“遵”礼,有乡饮酒、乡射之礼。清人《礼记集解》“乡饮酒义第四十五”“射义第四十六”“燕义第四十七”载有更具体的解释。“古之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20]王国维所提及的乡饮酒、乡射之礼,指向的正是这种宾主之道、长幼之序和君臣之义。简言之,即是支持传统社会(上至邦国,下至民间)运转的伦常法则。^③正是这些礼制/伦常的存在,乡人会尊敬、亲近乡大夫,外来归化的人“习而安之”。这里的乡饮酒、乡射之礼代表的是自辛亥世变之后已经不再存在或者不再支配社会的传统伦常。王国维从典律之中,借得文化地理的义涵,隐射的正是民初政坛的混乱以及伦常的失

① 黄孝舒题于吴昌硕所作《彊邨校词图》之后,时去吴氏逝世一年,曾载于1933年第9期《青鹤》。“栖迟海滨,流离江介”,指向屈原《楚辞·九章·哀郢》:“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东陵寄命,只帐横流。”“东陵”作为地名,则与“首阳”互义,典出《庄子·骈拇》:“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既将朱祖谋比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下而全节的伯夷,又暗斥了窃国的贰臣如袁世凯辈,进而又点明朱氏寄命新朝的无奈、乱世横而不流的气节。“西塞寻盟,已寒江水”,指向隐居于彊邨的唐代诗人张志和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然则张志和词中的桃花源式的世界已经不存在。

② 1916年10月上旬,王国维在题序后几日,书一信与罗振玉指出:他人皆仅题诗词,或者论述彊邨的校词功绩,而未及其它。“又为朱古微作《彊邨校词图序》,借‘彊邨’二字,记近来士大夫居上海一事。乙老(沈曾植)、叶鞠裳(叶昌炽)亦作之,则皆言校词事也。”参见齐鲁书社1991年版陈鸿祥所著《王国维年谱》一书第185页。

③ 《礼记》原文甚至引用孔子所言:“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又“乡饮酒之义,立宾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设介僎以象日月,立三宾以象三光。古之制礼也,经之以天地,纪之以日月,参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乡饮酒之礼甚至成为了伦理之基、政教之本。《礼记》在此一节上,更有详细的解释。“尊让、洁、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让则不争,洁、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辨矣,不斗辨,则无暴乱之祸矣。斯君子之所以免于人祸也,故圣人制之以道。”参见中华书局1989年版孙希旦所著《礼记集解》一书第1433、1424-1425页。

序。“暴乱之祸”原因在于“礼”的缺失,因而伦常不常,道统不统。^①

后世士大夫在对待乡国的观念上,又稍有变化。王国维进一步讨论了转变后的第二种情况,“后世士大夫退休者,乃或异于是。如白太傅之居东都,欧阳永叔之居颖上,王介甫之居金陵,盖有不归其乡者矣,然犹皆平生游宦之地,乐其山川之美,而习于其士大夫之情,非欲归老其乡而不可得也。”游宦地之所以值得眷恋,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曾经游宦之地受士大夫伦理教化改造,是有礼之邦,值得驻留;另一方面,士大夫这个“有情的主体”寄情的地方必须是有礼之邦。故而士大夫不愿意归乡,而认他乡——这个有礼之邦为自己之乡。在这个层面上,王国维进而说,“光、宣以来,士大夫流寓之地,北则天津,南则上海,其初席丰厚,耽游豫者萃焉。”“初席丰厚”“耽游豫”当然不只是字面意义上士大夫游宦之时,能在该地得到优待,进耽于此逸乐嬉游。实际上,王国维未道出的原因在于,天下大变,而津、沪两地为较早开放的口岸城市,能得风气之先。后来又因为废帝溥仪居于天津,故而聚集了不少遗老。而且,遗民住入津、沪等地租界,“在地理上而言,亦有脱离民国治下的象征意义。”^[21]

士大夫对于“乡”的概念在辛亥之后有了新的变化。“辛亥以后,通都小邑,桴鼓时鸣,恒不可以居。于是趋海滨者,如水之赴壑,而避世避地之贤,亦往往而在。”世变之后,乡国已经不再存在,遗老中“趋海滨者”当然也包括他王国维在内。^②世变后,沪、津两地聚集了不少遗老,“然二地皆湫隘卑湿,又中外互市之所,土薄而俗偷,奸商傀民,鳞萃鸟集,妖言巫风,胥于是乎出,士大夫寄居者,非徒不知尊亲,又加以老侮焉。夫入非桑梓之地,出非游宦之所。内则无父老子弟谈宴之乐,外则乏名山大川奇伟之观。”士大夫寄寓于此,已经不是先古(想象的乌托邦?)意义上的原乡(非桑梓之地),也不是有“礼义存焉”的游宦之所。如此不堪,何以遗民士大夫如彊邨、沈曾植、徐乃昌等人仍愿寓居于此?

“惟友朋文字之往复,差便于居乡。”王国维如是点出真正的原因。此句可见其与彊邨等遗民相似的隐曲心绪:清亡之后,哪里还有故乡,唯有以文字交往和文字事业为故乡。遗民们书信往复,结社唱酬,在这样的文字实践之中,寄托和想象那一去不可返的黄金时代。“然当春秋佳日,命侑啸侣,促坐分笈,一握为笑,伤时怨生,追往悲来之意,往往见于言表。是诚无所乐于斯土,而顾沉冥而不反者,盖风俗人心之变,由都邑而乡聚,居乡者虑有所掣曳,不能安其身与心,故隐忍而出此也。”心知人间已经没有故乡,“无所乐于斯土”,但仍然沉冥不返故乡,是因为沪、津两地得风气之先。要观天下、风俗、人心之变化,必须隐忍居住在这样的地方,这是王国维与老一辈遗老们不同之处。老一辈遗老们已近晚年,暮年壮士雄心虽是不减,但始终不比中年的遗老如王国维辈,仍思有所图。这个文字的原乡是那么抽象,后来者都难以清晰解答这其中究竟寄托了什么样的遗民心绪、什么样的文化想象。但可以明确的是,王国维寄情于甲骨文、殷周研究,词创作和词学研究,甚至最后的自沉,都与这种“生活在别处”的原乡想象,这种遗民地理学的政治意涵相关。

王国维的序文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视角,去看待《彊邨校词图》及其题咏中遗民身份的文化隐射。与为此图作序的其他名家不同,王国维的序文开篇明义即讨论了士大夫和乡礼传统对于遗民和传统社会的意义。在此番论述后,才又转而响应沈曾植对彊邨的讨论。“彊邨者,在苕水之滨,浮玉之麓,先生之故里也。先生既以词雄海内,复汇刊宋、元人词集成数百种。铅槧之役,恒在松江、歇浦间。而顾以‘彊邨’名是图,图中风物,亦作苕霅间意,盖以志其故乡之思云尔。”以“彊邨”作为校词图的名字,图中风物是他念兹在兹的故乡。在王国维寄情的序文中,又变成了遗民——未亡之人不已的嗟叹。已逝变成了想像的乡邦,重新发明的

^① 辛亥年,王国维东渡日本,易号“礼堂”。罗振玉《商三句兵拓本跋》云:“礼堂先生善说殷礼”。参见齐鲁书社1991年版陈鸿祥所著《王国维年谱》一书第11页。1914年8月2日在首次致沈曾植的书信中,称呼沈氏为“乙庵乡先生大人”,既谈及了地理学研究,也谈及自己最近才开始研究本国学术,尤其是研究“古代之文化、制度、风俗、旁及国土、姓氏。……此后岁月,尽委于此。”参见浙江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王国维全集》第十五卷第68-69页。王国维几年后归国,其为校词图所作的序文由沈序而提及“乡礼”“乡先生”之论式,并非一时灵光突现,而是致意再三、念虑多年的想法。

^② 辛亥世变后,王国维避世避地居于日本达五年之久。写作这个题序时,刚自日本归国不久,当然是多有感触,附丽了不少个人的身世之感。

传统在遗民的重重申述里,不就成了既是先验的我执,也是后设的追认!?

为解释“疆邨”这一符码所象征的传统(本邦),王国维惯用“上古—中古—近世”的对比列举,说明一以贯之的传统之文化意味。“夫封嵎之山,于《山经》为浮玉,上古群神之所守。五湖四水,拥抱其域,山川精美。古之词人张子同、子野、叶少蕴、姜尧章、周公谨之伦,胥卜居于是。千秋万岁后,其魂魄犹若可招而复也。先生少长于是,垂老而不得归,遭遇世变,惟以填词、刊词自遣,盖不独视古之乡。”^①称疆邨自古至今都有上古群神守护,隐然指向的是:那个逝去的传统,现今唯剩他们一众遗民守护。“五湖四水,拥抱其域,山川精美”,则文明源地的意义外,进一步道出,这样的伊甸园历来是俗世的士大夫寄情之所在。所列词人若张子同(张志和)、子野(张先)、叶少蕴(叶梦得)、姜尧章(姜夔)、周公谨(周密),都是词学史上的大家,代表了中古的士大夫。而疆邨则是今之古人,代表了近世的遗民士大夫。因而,朱祖谋在遭遇世变之后,“惟以填词、刊词自遣”的文学行为则是“视古之乡”。但又是“不独视古之乡”,因为原乡已逝,不可再追溯。“先生矜式游燕于其乡者如天上人,即求如乐天、永叔诸先生退休之乐亦不可复得。宜其为斯图,以见意也。”不仅是上古“游燕于其乡者如天人”,中古的“乐天、永叔诸先生退休之乐”也不可得。近世的情况似与上古、中古相似,然而又大有不同,因为上古、中古的礼乐时代已经一去不可返也。

王国维最后总结道,“夫有乡而不得归者,今日士大夫所同也,而为图以见意,自先生始。故略序此旨,且以纪世变也。”清亡之后,天下的礼乐传统已经崩坏,自此不得往复,文字的世界差便是寄存已失的记忆与想像的空间之所在。而这样的“世变”已经不止是朝代更迭、一姓之兴亡,而是所有士大夫共同面临的困境——“有乡不得归”,变成了“时间的遗民”。^{[18]35}相较于大汕的遁逃岭南,朱祖谋、沈曾植和王国维等清之遗民则是无处可逃、无处可归了。王国维这篇著名的序言最可为民初清之遗民的心绪见证,同时也见证了“遗民”形态已经转变成了“后遗民”的形态:“过去”死而不去,“将来”永不到来,“现在”则如“生活在别处”。

近人提醒,遗民书写文本中往往透露出自我认同的讯息,既涉文化的层次,也有政治性的指向。^[22]借文化话语书写政治感伤,这在民初遗民词中在在皆是。正如林立先生指出的,朱祖谋词中的京城意象“象征了他所依恋的事物:已经烟消云散的王权政治和过气的士大夫生活模式。”^{[21]110}朱祖谋词里的京城,这个失落的地理坐标,是他想象的乌托邦。在王国维的序言中,特地指出了上海这样的地方是一个令人生厌的恶托邦。寄托他个人情债和我执的地理坐标既非现实的恶托邦上海,也非朱祖谋的乌托邦京城,而是一个文字/文化的异托邦。对文化遗民而言,这个文字的异托邦虽不存在于现实世界,却存在于文学实践行为中。现实恶托邦的种种不足,想象乌托邦的不能致达,都在这种完美而有礼有序的文字异托邦中得到补偿,这是后遗民地理学的吊诡之处。

四、结语

填词图和校词图等作及其题咏是传统文人之文学实践的在场见证和事后追认。“从‘填词图’到‘校词图’、‘勘词图’、‘选词图’,可以说已经构成了一个系列,画作主题的变化与词学风尚的转移同步呼应,这为我们更好地观察清代以至晚近的词学发展提供了一个饶有趣味的视角。”^[23]诚然如斯,但是犹未道尽。填词图诸作作为词学实践的在场见证,不仅可看出词学风尚和主题变化,而且还可以看出题咏者想象一个共同体,进而参与建构图中人物主体的象征意义。或在现实中处于地理的边缘如大汕的案例,或在想象的空间中处于地理上的“无地”如王国维的案例,遗民地理与遗民书写的实践切切相关。

^① “封嵎之山”正是屈原《天问》所问的“长人何守”,柳宗元所答的“封嵎守之,其横九里。”《国语·鲁语》又有,“客曰:‘防风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前蜀杜光庭《郑顛别驾本命醮词》:“玉阙琼都,咫尺封隅之内;凝岚积翠,高低城邑之旁。”已经将“封隅之内”,当成了天堂所在的象征。封嵎两山正是在朱祖谋的原籍疆邨,即吴郡归安(永安)。上古传说中,防风氏身长九里,当然非凡人,称之为上古之神也不过分。

几代诗人相继留下了大量题词,这种联绵不尽的词学实践易被当成一个连续的传统。叶昌炽等人称《疆邨校词图》可“补迦陵之图”,^{[2]820}吴庆坻则题曰:“髯也如仙绝代无,红腔绿字尽追摹。词家掌故迦陵后,二百年来两画图。(迦陵填词图作于康熙戊午,逮今二百四十年矣。)”^{[2]827}图籍和诗词等文字书写是诗人在遍历世变沧桑之后,留作警幻的我执。两幅图画前后对比,易使人临图产生时间流逝、朝代兴亡,而唯有文字/图籍留传的今古对比的浩叹。而词人老逝,人世沧桑,唯有文字(慧业)作为色相(我执)的见证。

填词图及其题咏涉及了题咏者对图中风物和主体的评价与追认。在《迦陵填词图》中,评价的是陈其年及其在词学史上的地位,追认的是风雅不堕的传统,而罕有人提及作画者大汕和尚的遗民身份,以及他僻处岭南背后的意义。在《疆邨校词图》中,题咏者也一再地确认疆邨校词的功绩,以及他在词学史上的定位。然而,正如朱祖谋的挚友一再强调的那样,“侍郎词坛哲匠,人伦模楷。”^{[2]823}“不徒以词人传”,^{[2]626}“后世勿仅以词人目公”,又“进为国直臣,退为世词宗。”^{[2]814}恰若不可仅以诗僧看待大汕,也不可仅以词宗看待朱祖谋。他们虽是个体,但某种程度上已是作为一个文化传统的象征。

在这样的基础上,王国维至为巨眼,点破校词图等作或者泛而言之文字事业对于遗民来说,不仅仅是作为怀念旧朝的工具,而且是款款抒情的在场见证和想象乡愁的异托邦,一个地理学上的“无地”。在这一意义上,也能够明白后来者如陈寅恪在王国维自沉后的评论。“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然而也可能不在于陈先生夫子自道的“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24]而更在于那个“故乡”——士大夫传统一去不返。这个传统在文化地理上,只存于文字和想象中,成为了异托邦一样既存在而又不可见但又可以作为自我补偿的“无地”。

从(后)遗民地理学的视角去看待填词图、校词图及其题咏,一方面可见题咏者通过遗民情债的偿还和我执的确认,完成了个人的身份认同和前人的历史定位;另一方面,填词、校词等文学实践其实也如宗教或礼仪一般,在对文化地理和想象的乡邦之一再确认中,重建或发明了新的伦理秩序以安置自我的遗民情债和我执。遗民地理的种种意义经过几代的叠加和转变,最终促使朱祖谋和王国维等两辈遗民触图而回溯到了更久远的传统,并在这种文学实践中,附丽了一己不可释舍的乡愁。

致谢:笔者在为写作收集资料时,得益于哈佛燕京图书馆马小鹤先生、香港中文大学崔文东先生的襄助,谨此致谢!本文初稿曾于台湾大学举办的“民国风雅:现代中国的古典诗学研习营”(2012年12月14~16日)上宣读,此后根据诸位学者的评议意见修订而成。在此谨向台湾中央大学卓清芬先生、新加坡国立大学林立先生、台湾大学陈建男先生、南京师范大学黄浩然先生等学者深致谢忱!

参考文献:

- [1]张晖.龙榆生先生年谱[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
- [2]疆邨语业三卷 弃稿一卷 疆邨词剩稿二卷 疆邨集外词一卷 附世系 行状墓志铭一卷 疆邨校词图题咏一卷[M]//清代诗文集汇编:七八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3]夏孙桐.清故光禄大夫前礼部右侍郎归安朱公行状[M]//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北京:团结出版社,1995:625.
- [4]施议对.中国词学学的奠基人——民国四大词人之三:龙榆生[J].文史知识,2010(5-9).
- [5]叶恭綽.遐庵词话[M]//张璋,等.历代词话续编:上.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605.
- [6]毛文芳.图成行乐:明清文人画像题咏析论[M].台北:学生书局,2008.
- [7]钱穆.余君英时方密之晚节考序[M]//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3.
- [8][清]大汕.海外纪事[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9]大汕离六堂集[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
- [10][清]潘耒.救狂砭语 金陵览古 余生记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55-56.
- [11][清]王士禛.分甘余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2] [清]谢章铤. 赌棋山庄词话:卷二[M]//唐圭璋. 词话丛编:卷一.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3329-3330.
- [13] 姜伯勤. 石濂大汕与澳门禅史[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 [14] 汪兆鏞, 汪宗衍. 岭南画征略[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 [15] 冒鹤亭. 云郎小史[M]//张次溪. 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编:下.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965.
- [16] 徐珂. 清稗类钞:第8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6:3991.
- [17] 谭献. 复堂词话[M]//张璋,等. 历代词话.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1676-1677.
- [18] 王德威. 后遗民写作[M]. 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
- [19] 龙沐勋. 风雨龙吟室丛稿初编[M]. 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文学院,1931.
- [20] [清]孙希旦. 礼记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1989:1438.
- [21] 林立. 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究[M].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110.
- [22] 林志宏. 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M].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175.
- [23] 夏志颖. 论“填词图”及其词学史意义[J]. 文学遗产,2009(5):119.
- [24] 陈寅恪文集之三:金明馆丛稿二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18.

The Geographical Discourse of the (Post-)Royalist Writings

YAO Dadui

(Department of Chines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Royalist writings are often presented as political discourses of spatial an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Paintings and poetry at the age of turbulence signifies what the Royalists think and feel, and also testifies their public compensation and indebtedness from their private ideologism that the Royalists should die with the fallen dynasty. Chen Weisong's Tianci Tu (a painting describing Chen is writing poems with his lover's accompany) was the proof of two groups of Ming Royalists' difference choice, either to gain a government post in the new regime or to withdraw from the society as a royalist. In this sense, the Royalist writings are geo-political discourses. In contrast, the Qing Royalists are faced with the post-Royalist situation. Shen Zengzhi's preface on the Qiangcun Jiaoci Tu (a painting describing Zhu Qiangcun editing and proofreading Ci collections) initially depicts the post-Royalist's discourse on the geographical vista, while Wang Guowei puts it further as a theory of cultural nostalgia. To the Post-Royalists, the perfect and orderly nation could only exist in the space of writings and paintings. The heterotopia, which is real but untraceable in real life, could be regarded as a self-compensation of the lost dynasty and the lost cultural homeland for them.

Key words: Weisong Tianci Tu; Qiangcun Jiaoci Tu; (Post-)Royalist geography; cultural homeland

(责任编辑:江 雯)